

摘要：

本文分析了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公开国家发言中所涉及的宗教和神秘元素，选择了能够代表当代俄罗斯身份政治特点的五个案例。案例分析表明，这些语言中的宗教和神秘主题是为了推行国内政策而进行的一种自我塑造的尝试。本文认为，相比于从俄罗斯的宗教和政治传统获取现行政策合法性，这些涉及宗教与神秘元素的言论更多的是为了提升现任总统在公众中的欢迎度。俄罗斯的现任总统并不那么渴望对俄罗斯政治进行价值观上的更新，而是试图在与西方对抗中，找到权力体系的新合法化方式。

一、引言

在分析俄罗斯政治辩论的语言时，可以注意到自普丁就任总统以来，俄罗斯的国家政治语言一直在逐渐地丧失世俗性。在其第一（2000年至2004年）和第二（2004年至2008年）个总统任期内，总统经常提到，在他看来，俄罗斯是西方民主世界的一部分，可以将其未来明确地看作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另外，在他担任总统后，他的言论也包含了几乎在鲍里斯·叶利钦的演讲中几乎找不到的意识形态元素。2007年的“慕尼黑演讲”，标志着与西方的激烈意识形态对抗的开始，自2008年的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后，总统在演讲中提到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次数越来越少（尽管这些内容并没有完全消失）。并且，演讲中的宗教和神秘元素变得越来越突出。

俄罗斯政治语言的神圣化与另一个看似相反的现象相一致。近年来，主要是自2012年莫斯科发生的“乐队闹剧”（2012年3月，在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一支乐队在莫斯科的一座东正教教堂绝食抗议后，被以扰乱公共秩序的名义抓捕）以来，针对国家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结盟的行为，俄罗斯公共政治辩论逐渐不再回避直接批评教会及其政治参与。然而，这并不影响总统政治话术发展的方向。相反，它似乎故意而显著地与西方政治用语有所不同。俄罗斯内外政策的目标往往不仅以实用主义为基础，还涉及宗教和神秘概念。虽然不能说普京总统的言辞包含了赋予俄罗斯特定历史使命和道德优越性于西方的俄罗斯弥赛亚传统的声音，但可以注意到，他公开声明中频繁出现的宗教和神秘主题与俄罗斯的新身份政治相一致。它们强化了总统所想要宣传的观念，即俄罗斯形成了一个基于独特的精神纽带，并通过传统价值观的共同体建立社会团结，与西方自由价值观相对立的独立文明。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参考俄罗斯临时身份政治特征的选定例子，分析现任总统在公开演讲中包含的宗教和神秘元素。分析表明，普丁总统语言中提到的宗教和神秘主题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它们是出于推行国内政策目的而进行自我创造的尝试。这种自我创造主要针对俄罗斯接受者、俄罗斯联邦公民和自称俄罗斯人的后苏联国家讲俄语的公民。我们认为，这种自我创造更像是试图加强普京的公众支持，而不是增加他的政策合法性即借用俄罗斯宗教和政治传统去塑造俄罗斯当代的政治生活。总统的演讲与其说是希望俄罗斯政治在公理上复兴（尽管这一内容被多次强调），不如说是试图寻求他在与西方公开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创造的权力体系的新合法化。

二、文献来源与研究方法

所有治理制度都面临着以有效方式提供满足当地需求的公共服务的挑战。这要求治理系统组织起来，通过大量的协调与合作以规模经济的模式提供公共服务。分权和集权政权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来实现这些合作。中央集权制度通过高层决策控制的大规模、公共和层级结构中组织公共服务决策，寻求确保“内部”的跨层次合作。分权体制往往更依赖一系列相对自主的公共和私营组织的贡献，并纳入更广泛的问责机制，如地方选举或基于绩效的合同，以促进跨级别合作。

为了展示总统在演讲中宗教和神秘元素的重要性，我们选择了五个案例。它们可以作为这些主题的例证，以正确的方式在显而易见的宗教或意识形态背景下使用，并按照这个特定的关键要素进行解释。这是一个重要的初步说明。在分析总统的演讲时，必须谨慎地将更深层次的分析总统的动机，并解释其中包含的宗教和神秘主题。普京经常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历史或宗教相关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演讲的风格可能仍然十分随意。这一观察很重要，因为并非所有涉及宗教主题的声明都可以在这个背景下解释。这儿有两个典型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俄罗斯宣传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yov）2018年的著名电影《世界秩序 2018》。总统在这部电影里引用了德国将领伯哈德·克里斯托夫·冯·缪尼希（Burkhard Christoph von Münnich, 1683 - 1767）的著名言论，称“俄罗斯受上帝统治”。另一个案例发生于2018年，总统谈及未来俄罗斯可能卷入的一场核武冲突，将俄罗斯人比作将前往天堂的殉道者，而将他们的对手比作将“在地狱中灭亡”的人，因为他们甚至都不会悔改。这两个著名评论展示了我们研究中的方法论困难。历史和宗教主题经常出现在总统的语言中，超出了它们的适当背景。它们更多是文体手法和对著名历史故事的引用，而不是俄罗斯新身份政治意识形态取向的表达。这可能会导致过度解读的风险。一些西方观察家，尤其是代表保守圈子的人士，希望将普丁视为传统价值观或社会生活传统模式的捍卫者，以及自由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反对者。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准确。

本文使用的五个案例，其涉及的俄罗斯历史学和宗教神秘传统的引用可以明确地与当前俄罗斯身份政治联系起来。我们会把它们放在俄罗斯公共生活中的进行对比解释，以确定它们与该政治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解释了总统在2007年后提出的新观念即俄罗斯新身份政治。第二部分，分析了五个案例中神圣部分的语言。第三，我们从俄罗斯身份政治目标的角度提供了对总统的语言进行解释。

三、总统的新身份政治

在本文中，新的身份政治是指俄罗斯联邦当局采取或启发的行动，旨在影响俄罗斯社会的各个群体重新解释俄罗斯身份和“俄罗斯人”的含义，归属于俄罗斯社会，并参与创建俄罗斯文化和传统。这些行动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虑。首先，它们在媒体语言中表现出来（直接或间接受到国家控制），在重新解释学校课程（特别是历史方面），或在由国家推广和资助的文化和教育机构项目中。其次，新的身份政治得到了立法上的支持。例如，俄罗斯联邦宪法（2020年修订）和涉及众多国家安全领域的法律文件都包含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和身份内容。此外，近年来还出台了涉及刑事立法的变化，扩大了对官方历史解释的法律保护，并重新定义了对宗教人士感情的保护水平。第三，新的身份政治表现在俄罗斯政治精英代表，尤其是在总统所使用的语言中。

因此，为什么应该将当代俄罗斯的身份政治视为“新的”呢？主要原因在于，它与1991年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实施的身份政治根本不同。鲍里斯·叶利钦时代，尽管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并没有一致地民主化，但是试图将俄罗斯身份建立为更大西方身份的一部分。尽管在象征领域，人们仍然可以注意到对帝国过去的参考，并且当局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合作是正式的，但身份话语至少在其言语层面上是基于自由西方民主国家特有的价值观和标准的。这在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的规定中得到了体现。宪法明确规定，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公共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价值，它们的保护是国家的责任（第2条）。权利和自由的清单与西方采用的法治国家组织概念相对应（第17-64条）。国家权力的来源是人民，他们主要通过民主选举行使权力（第3条）。宪法还禁止存在任何国家意识形态（第13条）。此外，俄罗斯是一个世俗国家，确保了教会与国家的分离（第14条）。

将这些规定保留在2020年的宪法中，这不仅能够使得普丁能够在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内有资格再次竞选总统两个任期，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还包含了包含意识形态和身份内容的新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规定提到了祖先将他们的信仰传给了俄罗斯联邦公民，暗示着俄罗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第67.1.2条），并且国家有义务捍卫历史真相，不允许贬低俄罗斯保卫者的英雄壮举（第67.1.3条）。这就是新的身份政治复杂性的表现。一方面，官方声明和俄罗斯法律文件包含了关于民主价值观的重要宣言，包括尊重人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另一方面，正在引入新的法规，重新解释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范围，并旨在法律上保护当局所接受的俄罗斯历史版本。

新的身份政治的主要元素不仅包含在更新后的宪法中，还包含在其他法律文件中。重要的身份问题，包括历史事实的可允许和不可允许的解释，现在受到法律层面的规范。例如，经进一步修改，俄罗斯联邦刑法规定了对宗教人士感情的合法保护，而未为非宗教公民的观点提供充分保护（第148条）。经2021年修订的《关于纪念苏联人民在1941年至1945年伟大的祖国战争中的胜利》的联邦法禁止提及纳粹-苏联联盟以及纳粹德国和苏联在1941年之前的军事合作。它还反对否认苏联人民在击败纳粹和苏联解放欧洲国家背后的人道主义动机的决定性作用（第6.1条）。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俄罗斯战略文件中，明确的身份元素，大多数情况下与西方概念相对立。这种新的身份政治可以被看作是一套主要思想，引入到立法、媒体报道和教育课程以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的语言中。尽管这套思想不能被视为全面的，但它确实很好地表达了该政治的理念和主要目标。

首先，俄罗斯身份被描绘为基于保守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和堕落的西方相对立。俄罗斯通过挑战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遍性来体现其身份。相反，它成为在世界上推广传统价值观的中心，这些价值观是与宗教密切相关的精神价值观。其次，从10世纪以来，俄罗斯与各种形式的政治组织的历史延续至今，学界一般认为俄罗斯历史是从罗斯公国开始的（公元988年基辅亲王圣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洗礼）。现在的俄罗斯则是这罗斯公国传统的唯一继承者。第三，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要完成。它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后苏联国家的俄语公民，并传播苏联在其各个共和国的发展以及居民的社会文化发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最后，俄罗斯必须被认同为一个全球帝国。它不能放弃这种国际角色，否则就有失去自身身份的风险。因此，它应该拥有一个影响范围，这个影响范围包括绝大多数被国际社会认可的后苏联地区（除了波罗的海国家）。

四、案例研究

以上提到的新俄罗斯身份政治的要素（保守转向、强调俄罗斯的价值分离性、罗斯公国与俄

罗斯的历史使命统一以及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文明)都存在于总统的声明中。我们所指的并不是偶尔提及与当前政治事件相关的问题。总统的演讲,其中特别明显地体现了神秘和宗教元素,涉及到俄罗斯人的存在问题、社会和国家的未来,以及应该确保俄罗斯持续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声明根植于与西方持续加剧的冲突的背景中的原因,这种冲突是俄罗斯官方宣传的特征,甚至认为西方文化、生活方式和主导价值观对俄罗斯构成存在威胁。

(一) 苏联解体是一场地缘政治灾难

自 2000 年上台以来,总统已经做出了一系列行动,许多行动被视为是复兴苏联的象征。其中最典型的是将苏联国歌的旋律采用为俄罗斯联邦的国歌,并配以新的歌词,这些歌词令人想起苏联国歌的歌词。然而,将俄罗斯总统描述为对苏联时期进行复兴是不准确的。毕竟他并没有避免批评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此外,他也没有支持支撑苏联的重要意识形态元素。因此,不能说普京对苏联时代怀有怀旧之情。

如果总统的言论中可以检测到对苏联的任何怀旧情绪,那么那只是有限的情绪。然而,它具有明显的社会、道德、价值和历史哲学的主题。它表现在许多俄罗斯公共生活参与者对苏联社会中统一和一致的渴望上,这与当代俄罗斯社会的社会经济分层形成鲜明对比。苏联社会的统一和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神话,不符合事实。然而,它作为普京展示统一俄罗斯社会的道德价值和基础的出发点。有趣的是,普京曾是共产党成员,像许多当代政治精英一样,他目前认同东正教基督徒身份,他注意到基督教的价值观与构建苏联社会的道德价值形成了强烈的关联。在这个背景下,他声称,“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道德准则”,包含了构建苏联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基本道德规范和关键价值观,实际上是基于福音书的道德价值的简化副本。更有趣的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首根纳季·久加诺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声称,耶稣基督所宣扬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基本道德价值是相同的。尽管普京和久加诺夫的这些观点可能看似有争议,但它们确实意图将苏联描绘为建立在坚实的、普遍的人类原则之上的国家和社会。同样,苏联的解体也应该被他们理解为不是内部弱点和制度、意识形态或经济差异的结果,而更多地是对抗苏联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外部力量的破坏性影响的结果。

在总统有关苏联的演讲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历史哲学主题。该主题在俄罗斯极右派代表如亚历山大·杜金或谢尔盖·卡拉穆尔扎的著作中被大量利用。他们将苏联解体视为针对俄罗斯的外部侵略的迹象。所谓的侵略的后果不仅仅应该是政治危机和俄罗斯在特别是在后苏联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减弱,而且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它还是对俄罗斯文化和民族身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威胁。根据俄罗斯宪法,这种身份被理解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多民族社会的身份(第 3.1 条)。根据这种观点,苏联的解体不仅仅是政治或经济危机的高潮,而是一场社会灾难。

在这种背景下,总统在 2005 年对联邦大会的讲话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展现。当时,总统表示,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这一声明应该根据历史哲学和社会的关键来解释,后来他在与西方的激烈对抗的背景下解释了这一观点。2017 年,总统接受了美国导演与支持者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采访。普京声称,他对苏联解体的怀旧情绪没有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背景。但在他看来,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社会和所有前苏联共和国的社会来说都是一场悲剧。他提醒人们,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最后一天,有 2500 万苏联公民,他们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被留在了俄罗斯的边界之外。总统宣称国家的崩溃导致了家庭关

系的中断、卫生和社会体系的破坏、经济崩溃以及贫困的急剧上升。自苏联国家的解体开始以来，大规模的社会问题至今未得到完全解决。此外，苏联解体导致了后苏联地区的种族冲突，其中包括两次被俄罗斯描述为全面内部冲突的车臣战争。

（二）吞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历史哲学解释

总统在 2014 年俄罗斯联邦吞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面向黑海的一个港口城市）的事件中采取了类似的历史哲学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个背景下回避了反乌克兰的言论。他没有将与乌克兰的武装冲突视为吞并的原因。此外，在吞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以及顿巴斯冲突开始后的公开讲话中，总统经常声称，他仍然认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同一民族，他们永远是文化、历史和宗教上的团结一体。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寻找各种解释，解释为什么总统在基辅欧洲广场事件和“尊严革命”、吞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以及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和卢甘斯克州实际武装干预之后，没有采取公开的反乌克兰言论。同时，在受控制的媒体中确实经常出现反乌克兰的言论。此外，许多俄罗斯政治或知识精英代表也表达了反乌克兰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将自己描绘为俄罗斯民主反对派领袖的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也没有反对吞并克里米亚。因此，总统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历史和未来关系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之间的语言应该在这个背景下进行分析。

这种话术再次强调了历史哲学主题，尤其是在 2014 年 3 月 18 日吞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后发表的讲话中。这并非偶然，它没有包含反乌克兰的语调。吞并邻国的一部分也没有被描述为战争、政治或种族冲突的结果。相反，根据普京的说法，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回归了它们的归属地，回到了它们的故乡。总统解释道，“经过漫长、艰难和辛苦的航行，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回到了它们的港口，回到了它们的故土。”这明显指的是塞瓦斯托波尔作为与俄罗斯舰队相关的城市以及 19 世纪俄土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血腥战斗的历史。这种语言揭示了在历史上的统一概念。实际上，根据这个概念，其他的国家，比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构成了一个文化领域，即“俄罗斯世界”，其中心和存在和身份的保证是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吞并的历史哲学解释以及对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的团结的持续强调，符合总统在公共领域中创造的“俄罗斯土地的收集者”形象。这让人想起了瓦西里三世（俄罗斯帝国第二位国王，在他统治期间吞并了大量土地。），他在分裂了基辅罗斯后，开始统一罗斯，将之前无足轻重的莫斯科作为其中心。

（三）纪念弗拉基米尔大公：罗斯和俄罗斯连续的历史、统一的价值伦理与身份愿景

在俄罗斯历史中，“收集罗斯土地”的重要观念为莫斯科（莫斯科大公国，后来是俄罗斯）在过去占据罗斯人民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政治、文化和宗教上的理由。它还为将罗斯的政治、文化和教会首都从基辅（被称为“罗斯之母”）转移到莫斯科提供了理由。这个观念具有强烈的历史哲学和神秘特性。它的历史哲学方面表达了罗斯不间断存在的观念，以及它在世界上独特的使命，尽管包括基辅罗斯的崩溃在内的政治变化。它的神秘维度体现在“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中，它认为莫斯科的主导地位是合理的，因为莫斯科保持了对东正教的忠诚，而西部罗斯土地，包括基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受到非正教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影响，首先是立陶宛大公国，然后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在俄罗斯向西扩张并逐渐征服西部罗斯土地的过程中，“收集罗斯土地”的观念成为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文化的特有性质提出质疑的基础，以及贬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语言。在语言层面上，这甚至导致了乌克兰的一个人物为概

念的创建，称为“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即俄罗斯本身形成对比。这种语言方面也反映在俄罗斯正教会中，其领导人使用“莫斯科和全罗斯的大主教”这一头衔。一方面，这个头衔指的是罗斯的文化和宗教的统一。另一方面，它表明俄罗斯正教会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本地正教会的主导地位。

罗斯的历史延续观念，导致了对罗斯和俄罗斯的实际认同，也存在于当代俄罗斯政治的语言中。在右翼保守派和民族主义圈子（如亚历山大·杜金）的观点中，这一观念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扩张提供了正当性，并否认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普丁的语言中缺乏这种简化，因为至少在官方上，普丁总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为罗斯文化空间的统一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平与和解而努力的政治家。在他看来，罗斯和俄罗斯的历史延续概念具有公理化的维度。它指向了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基本价值观的延续，以及在几个世纪中确保了罗斯和俄罗斯的身份和生存。普丁在一次重要事件中表达了这一概念。在 2016 年 11 月 4 日，乌克兰东部冲突正在进行中，距离俄罗斯联邦吞并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已经过去了两年的时候，在莫斯科揭幕了一个献给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纪念碑。值得注意的是，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统治时期，莫斯科甚至还不存在（公认的建城时间是 1147 年，由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建立）。尽管如此，弗拉基米尔大公还是在罗斯的历史哲学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由于他决定从君士坦丁堡（988 年）接受东正教，他被认为是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和文化实体的创造者，东正教所宣扬的价值观和模式塑造了社会和个人生活。提及弗拉基米尔大公并将其置于罗斯和俄罗斯统治者的圣殿中，象征着现代俄罗斯继续着基辅罗斯的历史使命。

在揭幕仪式上，总统表示，弗拉基米尔大公为塑造俄罗斯人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基础。这些基础是俄罗斯人团结的源泉，使他们能够团结一致，克服各种障碍，战胜敌人，并使俄罗斯世世代代崛起的力量来源。据他称，俄罗斯人必须对抗对他们国家的挑战和威胁，而这得益于追溯到弗拉基米尔和罗斯传统的团结与和平的精神基础。普丁谈到弗拉基米尔大公时，重申了俄罗斯历史跨越了一千年的说法。

然而，即使像总统的声明中那样在价值取向的背景下展示罗斯和俄罗斯的历史延续概念，也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代乌克兰没有参与基辅罗斯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即使总统没有像杜金等思想家那样公开陈述，这种历史（历史哲学）思维也有助于俄罗斯政治生活中试图质疑乌克兰的主权或其作为独立国家的身份基础，以及其拥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语言。由于唯一的基辅罗斯遗产继承人是现代俄罗斯，乌克兰只能在与俄罗斯的密切政治、文化和宗教（在基本的价值观层面上）联系中保持自己的身份。

（四）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遗传独特性和道德优越性

普丁的言论包含对俄罗斯人独特性的引用，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基辅罗斯和俄罗斯历史哲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然而，当其他俄罗斯政治精英代表将其轻视和夸张时，这些引用的重要性有时会被忽略。前文化部长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就曾发表过一句著名的评论，声称俄罗斯人的独特性源于拥有额外的染色体，使他们与其他民族不同。

尽管在表面上与上述荒谬言论有些相似，总统关于俄罗斯人独特性的语言却截然不同。他将俄罗斯人的独特性看作是在道德和价值层面上，而不是生物或遗传层面上的。因此，普丁在 2014 年 4 月 17 日一次与全国人民的电视会议上也提到了俄罗斯独特的基因密码。然而，

他明确表示，他所指的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道德基因密码”，这是与基辅罗斯和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相关的因素之一。这种俄罗斯的道德基因密码使其在道德和精神上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此外，这种独特性被解释为道德优越性，尽管普丁在这类言论中并没有强调任何仇外或民族主义的刻板印象。

在总统看来，这种特殊的道德基因密码使俄罗斯人能够在其历史上克服各种困难。它也是社会规范和秩序的来源。其中一个重要的规范是俄罗斯人放弃个人主义，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为了社区（国家、社会或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

总统将这种立场与西方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行了对比。在他看来，“西方价值观意味着一个人专注于自己，而一个人取得的成功越大，他们就越好。”与此同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个人的成功并没有真正的价值。在这方面，他提到了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Н а м и р у и с м е р т ь к р а с н а”（在社区中，即使死亡也是美好的）。在他的解释中，俄罗斯人可以为他人、朋友或祖国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据他称，俄罗斯人的道德独特性和优越性在历次战争中表现为英雄主义和他们牺牲的能力。他还声称，俄罗斯人“不那么务实”，但他们有“更宽广的心灵”，这正是俄罗斯真正伟大的体现。

绝对强调社区（社会或国家）的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的重要性与俄罗斯东正教人类学相吻合，后者强调一个人只有在社区中才能成为一个人。因此，社区是人类尊严和价值的源泉，与西方概念中社区对个人的服务角色形成对比。

在谈论俄罗斯人的独特性时，总统也提到了其生物学意义上的遗传方面。然而，他的方法强调了俄罗斯民族的内在多样性，这是历史形成的结果，通过将各种民族群体融入一个国家和一个文化空间。这种方法符合俄罗斯联邦宪法中包含的“多民族人民”的概念。它可以理解为由深层次联系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民族群体组成的民族的超民族理念，这些联系不仅是共同的历史、语言或国家，而且是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更为普遍的价值观或规范。普京说：“我们的国家就像一个吸尘器，吸收了特定民族和特定国籍的代表。通过混合婚姻，我们创造了强大的基因密码。我们的基因密码是我们特殊优势之一。”这种观点承认了俄罗斯民族内部多样性的丰富性，同时强调了由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融合产生的团结和凝聚力。

这一声明的背景对政治原因至关重要。它是在俄罗斯与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冲突期间发表的，而且在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被吞并后不久。总统之所谈的团结，不仅是针对俄罗斯人（指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而且更重要的是针对那些属于“罗斯世界”的人，即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以外的民族俄罗斯人，以及主要是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等民族的代表。当时，他还说：“俄罗斯人的独特性基于道德准则。俄罗斯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属于“罗斯世界”的人，相信人类拥有某种更高的道德原则。因此，“俄罗斯人”不关注内在，而是关注外在。”

在评论这些话时，应该记住，俄罗斯支持所谓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叛乱，正是为了捍卫“罗斯世界”和乌克兰东部的俄语居民。这就是文化统一的概念，同时也是对其他民族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的辩护，参与俄罗斯公众生活的人在为他们对顿巴斯分裂分子的支持辩护时甚至呼吁对乌克兰进行公开武装干预。

（五）把精神激励作为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总统在谈论俄罗斯身份和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差异时，一直强调的一个特点是其对价值观问题的重视。在他的观点中，尽管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但俄罗斯民族是由共同的价值观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模式所联系在一起的。普京经常承认自己是东正教徒，他认为东正教会是培育和推广这些价值观的特殊盟友。然而，他的言论并不偏袒任何一个宗教组织。相反，他认为，对宗教传统所宣扬的价值观的精神和欣赏，对传统社会生活模式的接受以及对与之相对立的社会进步形式的拒绝，这些都是俄罗斯与当代西方不同的地方。

这个想法最重要的是为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对抗服务，后者被描绘为堕落和堕落。这个想法不仅正当化了对非传统家庭模式和非异性取向者的社会平等的拒绝，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质疑了构成西方民主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国家对个人的屈从地位，尊重自由，包括言论和财产自由，以及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份自我定义的权利。

在总统的观点中，区分俄罗斯与堕落的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共同体，主要是一种具有神圣维度的精神共同体。这种观点是在他 2012 年 12 月 12 日向联邦议会发表讲话时提出的。他指出，在他看来，俄罗斯社会缺乏精神联系。他认为，这些联系还包括了特有的价值观，如仁慈、同情、相互支持和政治上的援助。这些价值观将社会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明确涉及个人的幸福。在普京看来，俄罗斯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以这些价值观为荣。这些价值观使俄罗斯民族更加强大。因此，所有俄罗斯领导人都必须支持那些传承和加强传统价值观的社会机构。此外，在他的讲话中，法律可以用来捍卫传统道德，尽管没有合法的途径来确立和推广这种道德。国家不希望通过立法侵犯个人的信仰和观点。他补充道：“国家企图侵犯个人的信仰和观点，无疑是极权主义的表现。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不会走上这条路。我们不应该通过禁令和限制来行事，而应该加强社会持久的精神和道德基础。”总统宣布，与其国家干预世界观问题，不如支持俄罗斯文化、教育和青年活动的发展。在他看来，这些领域不能简单视为服务，而是对俄罗斯的负责任和成熟公民进行和谐的道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言论得到了实践的体现，包括将宗教教育纳入公立学校、支持民族主义爱国青年组织 *Yunarmiya* 以及俄罗斯东正教会开展的社会和教育活动等重要社会和意识形态活动。然而，在评估 2012 年所说的话的实际含义时，必须考虑到在普京的任期内，俄罗斯意识形态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对其产生的影响。考虑到 2012 年莫斯科基督教大救世主教座堂发生的“皮带教团”抗议事件，这些话难以忽视。该事件导致了俄罗斯刑法关于保护信徒宗教感情的修改，而对非宗教人士的信仰则没有得到保护。一位典型的例子是视频博主鲁斯兰·索科洛夫斯基，他因在叶卡捷琳堡一座教堂捕捉宝可梦而被控犯有侮辱宗教感情罪，并被判刑。最后，将意识形态因素引入国家立法的最重要阶段是 2020 年的宪法改革。该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宪法中引入了对上帝的祈祷，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联合，并仅对这种家庭模式给予法律保护。

国家承诺不通过干涉个人世界观领域的限制性立法来进行意识形态介入的说法并未兑现。相反，作为俄罗斯与自由主义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差异的源头和基础，精神生活已成为国家积极施加压力的领域。这种压力表现在支持各种社会和教育倡议，这些倡议被认为符合普京政治议程的角度来看是可取的。它还导致了立法的干预。因此，精神生活已成为俄罗斯内部政治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中。

五、解释与讨论

在分析总统的许多其他讲话时，值得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这样的话术意味着什么？它如何展示俄罗斯政治生活的真相，尤其是其价值观和人类学方面？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复杂而无定论的。一方面，普丁的确实唤起了存在于俄罗斯历史哲学和神秘主义中的主题。另一方面，这些讲话发生的背景与当局的直接政策目标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对俄罗斯社会的意识形态影响相关联。

试图解释总统演讲中的历史哲学和神秘主义性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时，应该推断出三个问题：首先，话术的演变，让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内容的增加；其次，他在政策中对待宗教的方式（特别是在内部政策和与所谓的近邻国家的关系方面，即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不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最后，总统所说的话是否也体现在他的其他活动中，这进一步意味着俄罗斯政治的实质性变化和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价值强化的实际尝试。

（一）日益神圣化的政治话术

自 2000 年接替鲍里斯·叶利钦担任总统以来，新总统的言论明显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初几年里，他试图打造自己作为现代领袖的形象，与叶利钦的公众形象形成对比。他既引用了帝国传统，又恢复了象征性姿态，比如恢复了苏联国歌的旋律。与此同时，他支持俄罗斯的民主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不允许违反总统任期的宪法期限，并支持言论自由和独立媒体。在那段时期，他将俄罗斯描述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他认为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随后梅德韦杰夫在他的总统任期内（2008 年至 2012 年）采取了类似的风格，尽管解释背景明显不同——在普京于 2007 年的“慕尼黑演讲”和 2008 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战争之后。

总统言论的变化，包括其中的历史哲学和神秘主义元素，在 2007 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后可以注意到。他宣布俄罗斯不赞成当时由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提出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模式。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支持者，尤其是来自代表右翼和保守派圈子的人士，强调了“慕尼黑演讲”的意义，认为这是他的政策思想取向的转折点。

总统话术中的意识形态演变不仅受到俄罗斯联邦参与的外部冲突的影响，还受到俄罗斯国内的重大变化的影响。在 2008 年 12 月 5 日莫斯科和全俄牧首亚历克西二世意外去世后，2009 年 1 月 27 日，基里尔（冈迪亚耶夫）大主教当选为他的继任者。这一变化导致俄罗斯东正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日益密切。在文化政策、价值观或反对西方民主社会特有的价值观等方面，这种合作有时呈现出共生的形式。

总统的言论反映了自 2007 年以来俄罗斯外部政策和各个内部政策领域发生的“保守转向”。这在言论自由和大众传媒、教育以及意识形态问题的法律规定程度等方面尤为明显，比如对宗教保护和官方接受的俄罗斯历史版本的推广等。在语言层面上，“保守转向”的概念体现在放弃了自由民主政体特有的政治和公共生活语言。另一方面，这种语言表达了俄罗斯的历史使命和重新夺回其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的概念。虽然不能合理地说俄罗斯教权主义思想已渗入官方语言，但不可忽视的是其基本特征——俄罗斯和俄罗斯宗教历史哲学。这些包括：

（1）俄罗斯的特殊使命观念，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延续观念；（2）对俄罗斯的精神优越性的信念（其根源是莫斯科第三罗马的概念）；以及（3）认为俄罗斯在文明水平上与欧

洲根本不同的观点(其根源是 19 世纪俄罗斯斯拉夫派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欧亚主义者的观点)。所有这些观念在普丁总统的公开演讲中越来越容易辨认,尤其是当他提到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分离或将俄罗斯描述为建立在永恒的精神基础上的“精神”国家和社会时。

在解释总统言论的演化时,不能忽视其政治背景。这种演化伴随着俄罗斯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所谓的邻近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强硬化。在俄罗斯,对西方文化的冷嘲热讽、堕落和衰亡的努力伴随着对西方文化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对抗。与此同时,对后苏联地区的政治压力导致否认某些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分离,并质疑其领土完整性: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以及近年来的哈萨克斯坦。特别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占据了历史上的一大部分领土,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的历史观念以及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的统一构成了质疑其民族、文化和语言分离以及国家主权的意识形态论据。

(二) 当宗教成为一种工具

在莫斯科老牧首去世后,新牧首基里尔进一步加强与总统府的合作。俄罗斯东正教会最有影响力的主教们多次表示对当局以及个人对总统的全力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最近的两则声明。在 2021 年 11 月发表的一次采访中,新牧首称俄罗斯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在他看来,目前没有分裂俄罗斯社会的问题。俄罗斯正在发展,并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成功地抵制了外部压力。由于解决了社会问题并在重要的公共生活问题上取得了高度的社会共识,俄罗斯可以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在另一次于 2021 年 10 月发表的采访中,被认为是总统的精神顾问的大主教蒂霍米尔(舍夫昆诺夫)发表了一句已经成为名言的话,他说现任总统已经获得了如此大的权威——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以至于很难找到一个体面的继任者。据蒂霍米尔主教称,对俄罗斯而言,主要问题是普丁并非是不朽的。他是拯救俄罗斯的人,他完全为了国家利益而在牺牲自己。

这些声明显示出俄罗斯东正教会从与国家的合作中获益。特别是,教会及其相关组织是国家资助系统的主要受益者,该系统支持执行重要教育、文化和慈善职能的社会组织。此外,当局还采取了许多其他措施支持俄罗斯东正教会,如支持新教堂的建设,在公立学校开设东正教文化基础课程,以及将神学视为学术学科的认可。

然而,国家对教会的支持程度和方式引发了对此类支持动机的质疑。一方面,国家受益于教会对实施其认为在政治上有利的社会政策目标的支持。一个例子是针对 LGBTQ+ 社群的运动,导致 2013 年通过了一项禁止宣传“非传统性行为”的法律,对任何形式的 LGBTQ+ 社群代表公共存在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国家对教会在道德问题上并未提出任何要求,这些问题在社会上没有足够的支持(如禁止或限制堕胎)。同样,国家当局支持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俄罗斯政治上有利的地方的存在,特别是在白俄罗斯(当地教会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结构的一部分)或乌克兰(乌克兰东正教会是莫斯科主教管区的一个自治部分,支持亲俄罗斯政治家,在乌克兰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许多国内外政策方面(特别是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但也包括与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教会已经成为实施一种非常务实的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工具,该政策服从于政治、经济或军事利益。

六、结论:神圣化是为了塑造自身形象

即使在严格的政治话题上发言时,总统的发言内容常常令人费解。有时,它充满了形而上学

的深度；有时，它唤起了对失去的过去的怀旧之情，或者充满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宗教希望，似乎超越了政治生活的特征。这种情感语言出现在他最重要的声明中。总统的言论被认为是对西方务实政治语言的摒弃，因此，至少在官方信息中，他的言论被认为是对西方政治模式的转变，以实现明确的政治目标。它被认为标志着向具有历史使命的语言和政治的转变，这种使命超越了政治、经济或军事维度。这是许多俄罗斯新保守主义和新帝国主义代表希望解释普丁言论的方式。根据这种解释，普丁总统对世俗主义的公开拒绝，频繁提到宗教思想（主要是东正教），以及对上帝的召唤，可能指向一种新的政治愿景，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深度，回应了人类精神的深度和俄罗斯本身作为一个建立在精神基础和价值观上的国家的独特性。尽管很难否认普丁的言论确实包含了神圣化的元素，但对宗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欣赏并不符合于该生活的道德标准的变化。除了这个基本的、虽然难以衡量的论点外，人们还可以指出另外两个更为明显的论点，这些论点表明所讨论的神圣化是他的身份政治的一部分，缺乏任何实际的形而上学深度或更深刻的信息。

首先，虽然总统反复提及宗教和神秘主题，但他并没有决定将宗教作为当代俄罗斯的身份基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俄罗斯社会虽然在公共生活中正教存在显著，但是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社会。因此，根据他的说法，将这个极其多样化的社会联系起来并确保国家稳定的俄罗斯“民族理念”的主要元素应该是爱国主义。虽然没有将宗教置于他的身份政治的中心位置，其只使用了其中一些元素，他认为从即时政治目标的角度来看是有利的。

其次，在总统的声明中发现的宗教和神秘主题被摆脱了其解释背景，并被放置在政治和历史哲学引用的外部背景中。它们促进了一个观念，即俄罗斯与西方是分离的，西方自由社会的价值观与传统俄罗斯的价值观不相符。它们还为重新解释俄罗斯的历史提供了支持。这种重新解释明确地参考了当前事件，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文化独特性和主权。

所有上述考虑都可能导致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普丁总统政治语言的神圣化更多地是为了进行自我形象塑造，而不是对内外政策进行实质性变革的真正意愿，即使它很好地利用了俄罗斯的政治和宗教传统。与此同时，这也表明，从对政治生活中宗教领域的公开赞赏到根据所宣布的价值观进行实际的根本性转变之间的道路通常是相当漫长的——这种观点可能适用于试图通过支持武断定义的传统价值观来激发“保守主义革命”或复兴的国家。

编译 | 曾润波

文献来源: Składanowski, M., & Smuniewski, C. (2022). From Desecularization to Sacr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Language: Religion and Historiosophy in Vladimir Putin's Preparations for War. *Verbum Vitae*,40(4), 869-891.

Political 理论志